

文致太平

——何休与公羊学发微

黄朴民 著

又致太平

——何休与公羊学发微

黄朴民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黄朴民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6
ISBN 978-7-5538-0123-0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何休(129~182)—人物研究
②《公羊传》—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IV. ①B234.99②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6947号

WENZHI TAIPING

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

作者:黄朴民

责任编辑:彭卫才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125

字数:270千字

ISBN 978-7-5538-0123-0/B·110

定价:25.00元

承印: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我个人的研究如果以发表论文为标志，那么应该说是在1984那一年《杭州大学学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孟子仁政思想新探》，它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现在回头看，文章写得很肤浅，没有值得夸耀学术价值，唯一有点意思的是，它是按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来诠释孟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地位的。但是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铅字，那种激动与振奋是至为强烈的，也决定了我日后侧重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趋向。

我硕士学位论文是《孟子政治思想研究》，孟子是儒家“亚圣”，历代有关其学说的探讨成果已是车载斗量，叠床架屋，要出新意的确比较困难。所以我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孟子政治思想的同时，重点放在总结孟子学说价值及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方面，主要的工作是考察了孟子身后地位的浮沉，阐释了孟子学说内在逻辑论证体系，先后整理出《历代贬孟述略》《孟子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等一系列论文，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虽然说这些文章还显得稚嫩，属于习作性质，但是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丰富了孟子学说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了人们认识孟子思想的视野，就我本人来说，则是对先秦儒学的



总体情况有了宏观的掌握和理解，为下一步转入两汉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85—1988年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对儒学研究的重点开始由先转入两汉，这是因为我根据自己对整个学术动态的了解，意识到先秦儒学的探讨已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当时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新材料尚未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我而言是勉为其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汉代思想史的研究尚呈现比较单薄的面貌。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对该时期思想的意义与地位，一般都持轻视的态度，认为两汉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谷，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理论，是带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荒诞之说，有人就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斥为“神学”。这看法过去在学术界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禁区的打破，这类机械庸俗的观点已渐渐受到怀疑，开始动摇，但是，要真正使两汉思想史的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其有关问题得到正确的认识，合理的评价，仍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应该说，我比较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学术信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适时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重心的转移。

在阅读理解两汉思想文化基本典籍的过程中，我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两汉的思想，虽然不像先秦百家争鸣那样显得生机勃勃，绚丽多彩，也没呈现魏晋玄学那种具有较高抽象思辨性质的特色，更不曾具备宋明理学那种博大精致的体系性、通融性。然而，它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逻辑环节，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概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对建统治秩序在思想上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之间的相互联系。诸凡古代社会中占统治



地位的政治思想之基本范畴，如“仁义”“德刑”“礼法”“王霸”“义利”“经权”等，均已由两汉政治思想提供了较为彻底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与先秦时代不同，它们是通过当时国家机器的权威力量，而被具体落实到社会生活之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心理认同。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虽说有所发展，但不过是对两汉政治思想的扩充与论证而已，用一句熟悉的成语来表述，便是“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后世社会其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两汉时期所确立的封建正统政治思想，进行哲学、伦理或其他方面的深化与阐述罢了。

在解决了战略全局的抉择问题之后，余下的便是如何在战术层次上选择合适的突破口了，在拱辰师、昌五师的具体指导下，我把两汉时期“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号称“群儒首”

“儒者宗”的董仲舒作为自己研究汉代思想史的主要对象，并以他为枢纽，上溯战国后期，下迄东汉，对集中体现今文经学特色的汉代儒学思潮进行前后呼应、详略有序的分析 and 总结，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董仲舒与新儒学——两汉儒学思潮研究》。

再接下来，我又开始注重对东汉最后的“公羊学”大师何休及其思想进行考察与研究，这是我本人研究两汉思想史方面新进的具体标志。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汉代儒学发展思潮中，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要对汉代思潮发展全貌、基本特征要做出准确的勾勒与揭示，关键在于认真剖析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嬗变历程、学术体系以及得失地位。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



《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揭示了何休在《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说明何休不愧为一代《公羊》巨子，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然而，学术界对何休的思想史地位的关注长期以来显得不足，没有一部专门以何休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何休评传》一书，它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全书分为八章，从汉末社会嬗变与经学思潮深化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揭示了何休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化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通三统”“文致太平”尚“偏战”贵“井田”，以及“灾异观”等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伦理、民族、哲学观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使何休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获得了立体性的展现，从而大大深化了有关何休其人其学的认识。

《何休评传》的最显著特色，是将微观资料考辨与宏观学理有机结合起来，将强烈的现代意识与深沉的历史底蕴融为一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玄钩要，拨开笼罩在何休学说表面的神学迷雾，展现其政治理性的光彩，即从哲学高度指导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苦心孤诣，从而说明了何休学说的文化意蕴所在，再现传主的文化生命。至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我也特别注重学术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见解。如指出“贵偏战”为何休军事观念的价值取向，“进夷狄”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生生不息的理论依据，“灾异二类说”。具有合理进步的因素，《解诂》一书非历史编纂著作而实为历史哲学著作，等等，均是言之有据的新看法，对人们进一步探讨何休以及《公羊》学理论或许



不无一定的启迪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我在研究何休与《公羊》学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的改进，这就是我开始完全按照经学研究的既定规范，来认识与理解何休的思想，而不再是依据现代哲学的模式来进行观照和评估，这正是《何休评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天人合一：董仲舒舒与两汉儒学思潮》，较有价值的原因所在。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改，宗旨是要实现陈寅恪关于对古代思想要抱“同情之理解”的主张，反映在具体经学大师的研究上，也即要用合乎经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实事求是寻求可信的结论，而不宜用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去加以图解。换言之，是根据“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在模式”去从事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当年研究董仲舒学说时的最大遗憾，是对董氏作为经学家的特定身份注意不够，而《何休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因此书稿的学术品位与价值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何休评传》出版迄今又十五六年过去了。今天重新检阅其书，我发现其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其他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或许不无一定的帮助。因而，当岳麓书社提出重刊此书的建议时，我即欣然同意，并对原书作了部分修订与补充，使之较原书更为充实与丰满，希望它的出版，为深化两汉经学史、思想史的研究略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当然，囿于自己的学术水平，本书的不足之处亦在所难免，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是为序。



第一章 何休所处的时代	001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002
（一）皇权的衰落	004
（二）统治权力分配上的冲突	004
（三）衰世固有的弊端	007
二、汉末的儒林大分化	012
（一）人格分裂的虚伪者	013
（二）无奈的避世归隐者	014
（三）悲壮的取义殉道者	016
（四）冷静的求索者	018
三、经学的困境	022
（一）弊端丛生的经学模式	022
（二）经学内部滋生的某些积极因素	029
第二章 何休的生平与事迹	033
一、家世与学术渊源	035
（一）何休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035
（二）成就大师的学术渊源	038



二、在政治与学术的漩涡中沉浮	043
(一) 从诏拜郎中到景从陈蕃	043
(二) 废锢免官与著述《春秋公羊传解诂》	046
(三) 晚年景况	055
第三章 孤独前行的《公羊》巨子	061
一、抗衡古文经学	063
(一)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斗争的由来	063
(二) 何休与郑玄、服虔等人的学术论战	069
二、著作等身	076
三、功在《公羊》	083
第四章 “大一统”与“进夷狄”——何休的政治思想体系	091
一、“大一统”思想的弘扬者	093
(一) “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与《公羊》学的一统观	094
(二) 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色	103
二、“仁义”说与“礼乐”观	113
(一) “仁义”说的内涵及其价值	115
(二) “礼乐”精神与“孝道”论述	124
三、“夷狄进至于爵”的民族思想	135
(一) “夷夏之辨”的历史渊源	135
(二) “进夷狄”及其时代文化意义	141
第五章 “张三世”与“文致太平”——何休的历史哲学理论	153
一、开创《公羊》“三世说”的崭新境界	155



(一) 《公羊》先师的“三世说”源流	155
(二) 何休“张三世”理论的基本内容与价值	160
(三) 何休历史哲学中的“善复古”不和谐之音	169
二、“通三统”与“《春秋》王鲁”	172
(一) 《公羊》“三统说”的内涵与实质	172
(二) 何休“通三统”的主要观点	179
(三) “据经行权”与政治理性精神	186
 第六章 尚“偏战”与贵“井田”——何休的军事与经济思想	195
一、崇礼尚仁的军事思想体系	197
(一) 儒家军事文化传统及其对何休的启示	197
(二) 军事思想的嬗变历程与何休的“复古”情结	202
(三) 何休军事思想体系解析	208
二、以倡导井田为中心的经济学说	216
(一) 东汉土地兼并痼疾与井田之议的风行	217
(二) 何休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	221
 第七章 天人之际——何休的灾异观念	229
一、《公羊》学“灾异”观传统及其对何休的影响	231
(一) 董仲舒建立“天人合一”图式，“始推阴阳”	232
(二) 董仲舒之后《公羊》“灾异”理论的演变	235
(三) 两汉《公羊》学“灾异”观评析	241
二、何休对《公羊》“灾异”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247
(一) 《公羊》“灾异”说的集大成者	248
(二) 何休对《公羊》“灾异”说的发挥	255
三、何休阴阳灾异理论的现实精神	261



第八章 从中衰到复兴——何休学说的历史命运	269
一、在历史的波谷中沉浮	271
(一) “不绝如线”	272
(二) 毁誉参半	278
二、统一与进化的双重变奏	287
(一) “大一统”强音	288
(二) “张三世”新声	294
 第九章 秦汉思想文化的再认识	 305
一、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306
(一) “大一统”原则与秦汉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	306
(二) 阴阳五行思想与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	311
(三) 融会贯通与秦汉思想文化的显著特征	316
(四) “大一统”与秦汉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321
二、两汉时期的讖纬文化现象	326
(一) 讖纬的由来及其实质	327
(二) 汉代讖纬流传之状况	329
(三) 讖纬对两汉社会生活的影响	332
(四) 对两汉讖纬文化现象的反思与批判	337



第一章 何休所处的时代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二、汉末的儒林大分化

三、经学的困境



何休是东汉思想界的巨擘、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者，他同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也是特定时代的文化骄子，社会生活理性思索的承荷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何休思想的核心是其哲学思想，这一特征决定了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和理论构建势必紧密地从属于现实社会生活，为回答时代重要政治命题进行不懈的努力，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长链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以自己丰厚的学术贡献而载入史册。何休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关系，作为思想家个体与整个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血缘纽带，要求我们在考察思想家生平事迹、分析和总结思想家理论体系与基本特征之前，了解和认识造就他们的复杂社会背景。现在，就让我们将视野伸展到幽远的东汉末年，踏着历史的履痕，和读者一起去寻求将何休推向思想史长河的社会动因。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东汉末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次走向分裂的前夜。当时整个社会已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问题的严重，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斗争的进一步激化，政治生活的高度黑暗，生产力发展的趋于停滞，阶级矛盾的无法调和，民族关系



的紧张恶化，等等。

这一社会危机的由来已久。早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不久，就出现了社会动乱的初步迹象，建武十六年（40）已是：“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①；另方面统治者的严酷政治也开始出笼：“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②汉明帝（刘庄）时，情况更有所严重：“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③出现了“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④的现象。到了汉章帝（刘炅）时，一方面是民众生计维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饥谨屡臻”；另一方面是政治运作问题丛生：“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⑤

这些史料，大多出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的诏书，是统治者自己所承认的事实。它们表明了，早在东汉前中期，黑暗政治就在孕育形成过程之中了。不过，从总体上看，东汉王朝的政治，在初期还是相对清明的，其统治基础，也是比较稳固的。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情况遂有了质的变化，其政治发展总的趋势是“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⑥统治者已不能再照常统治下去了。

注释

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以下该书引文均同此书。

②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④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⑤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论》。



（一）皇权的衰落

《后汉书》作者范曄论述汉安帝（刘祜）是“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①。这不仅是对汉安帝一人处境的写照，也几乎是东汉中期各位皇帝共同遭遇的描绘。据《后汉书》各帝本纪的记载，可知安帝以后的顺帝（刘保）11岁即位，30岁去世；冲帝（刘炳）即位时才2岁，3岁即死；质帝（刘缵）即位时8岁，9岁便为外戚权臣梁冀下毒酖弑；桓帝（刘志）即位时15岁，36岁去世；灵帝（刘宏）12岁即位，34岁时去世；献帝（刘协）即位时9岁，40岁那年逊位于魏文帝曹丕。这些君主多以冲龄登基，始受制于外戚邓（骘）、梁（冀）、窦（武）诸家，既而受摆布于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侯览、曹节、蹇硕等宦者，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傀儡。皇权的动摇，乃至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由此构筑起来的封建秩序也随之混乱，直至崩溃。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②东汉末年的历史也反映了这一点，当时社会大动荡发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一种“代表着秩序”的“王权”（皇权）的存在。

（二）统治权力分配上的冲突

皇权的衰落，极大地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围绕统治权益再分配而展开的剧烈斗争，是皇权衰落的客观表现。在当时，这种斗争主要体现为外戚集团与宦官集

注释

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论》。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3页。



团的对峙与搏杀。更易得到皇帝本人所宠信的宦官集团，曾多次凭借诸多有利条件而在权益生死角逐中一度得势，但最终还是因为得不到象征着封建文化主流、拥有巨大政治道德优势的第三势力——儒生官僚集团的任何支持而败北。

关于这场统治权益残酷角逐发生的背景、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及其重大影响，南朝时范晔曾经作过清晰的分析论述。对外戚擅权，范晔首先指出其历史由来以及在东汉时期的普遍表现：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半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①

范晔接着对外戚擅权的恶果以及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予以了辛辣的揭露：

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纆绁于圜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辘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②

祸之所及，不仅仅是外戚集团自身，而且是整个王朝的根本利益。

对于宦官秉政，范晔更是深恶痛绝，这其实也是替汉末广大士人立言。范晔先是考察了这一现象发生的背景，指出这其实是年幼皇帝以毒攻毒的结果：“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

注释

① 《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序》。

② 《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序》。